

三國史研究



张大可 著



7

三 国 史 研 究

张大可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325,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226-00237-x / K · 26 定价：4.9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建国以来第一本三国史研究个人专集。全书收作者论文 24 篇，分为六组，从不同的侧面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着重探讨了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突出魏吴对峙的主线，评述了三国时期主要历史人物的贡献，形成一家之言。本书还对建国四十年来学术界研究三国史的成绩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如何突破三国史研究的意见。各篇论文，议论平实，论据充分，行文流畅，雅俗共赏，不仅可供史学界和广大读者阅读，而且可作为高等学院历史本科教学参考书。

前 言

我研究三国史的契机，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一次大学生学术讨论会。时间是在1962年仲夏的一天下午，地点在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楼第三十二号楼的四楼上，参加者北京大学中文系1961级古典文献专业班全班同学，人数二十余人。当时，我是这个班的成员，中国通史课的课代表。当这门课程讲到汉末魏晋之时，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学生学术讨论会，同学们都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认真准备。我们讨论的议题是对学术界替曹操翻案的问题展开争鸣。1960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曹操论集》，有不少同学都找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有的还搬出了《三国志》和《后汉书》翻查原始资料。我们当时都还十分稚嫩，也有点初生牛犊之气，敢于非难时贤。在讨论中谁都不否认曹操统一北方、削平群雄的伟大功绩，但谁也弄不明白象曹操这样一个极端奸险诈伪的权谋家，不知怎么在翻案发起者的文章中变成了古代人民的解放者！在“文革”的十年风暴中有一句口号：“愈是清官愈要批判。”这是否是历史对这场替奸臣揭去奸臣帽子的翻案运动所作的总结或惩罚，留待未来的历史家去作定论罢。今天回顾这件往事，说明了六十年代的青年精英对于时代的思考。我个人则从此逐渐养成了对争鸣问题的再思三思的习惯，并由此而引发对三国史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于是有今天的这样一个成果。

本书收文二十四篇，分为六组。第一组文三篇，总论三国鼎立的形成和汉末军阀；第二组文五篇，论形成三国鼎立的三大战役及外交；第三组文三篇，论三国的创业之主；第四组文五篇，论三国的重要谋臣；第五组文四篇，论曹魏屯田、孙吴部

曲、孙吴对江南的开发及三国民族问题；第六组文三篇，论三国的统一。末篇是建国近四十年来的三国史研究述评。附录一文，是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副研究员谭良嘯同志应邀提供的。《西北大学学报》、《成都大学学报》、《青海师大学报》、《西北民院学报》、《汉中师院学报》、上海《学术月刊》、武汉《江汉论坛》、《青海社会科学》、甘肃《社会科学》、《西北史地》、《兰州学刊》等刊物的编辑同志，他们为本书的部分文章提供了学术交流的阵地。缪钺教授为本书题签。兰州大学科研处，对本书出版作了大力支持。以上，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 者 1987年9月

目 录

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	1
董卓及其凉州兵团·····	20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	33
官渡之战及袁绍集团的覆灭·····	48
赤壁之战与三国鼎立·····	67
赤壁之战考辨·····	78
夷陵之战与三国鼎立的地理均势·····	91
三国形成时期的外交·····	105
论曹操·····	126
论刘备·····	149
论孙权·····	167
论曹操的智囊团·····	184
论二荀程郭·····	202
论凉州智士贾诩·····	214
论诸葛亮·····	226
论孙吴儒将·····	240
论曹魏屯田·····	254
论孙吴部曲兵制·····	274
论孙吴政权对江南的开发·····	296
论三国时期的民族政策·····	310

论诸葛亮出师.....	326
论三国一统.....	346
论三国一统人物.....	372
建国近四十年来三国史研究述评.....	379
附录：三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和文物研究概述（谭良啸）.....	405

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

一、多因素的历史原因

三国鼎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特殊的历史课题。不仅三分故事自宋代以来由于平话、戏剧、小说的影响，已是家喻户晓；而且形成三分的历史发展，威武雄壮，可供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但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这一课题的研究，似乎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目前史学界已成定论的观点认为：“三国鼎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其理由是：“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①。”这就是三国鼎立的“必然性”理论，可名之曰“经济均衡论”。史学界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论著和各种教科书，对三国鼎立的想法都没有越出“经济均衡论”的藩篱。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长江流域已有巴、蜀、楚、吴、越等国家的建立，何待于两汉以来的江南开发形成经济均衡！割据长江上流的刘璋、刘表，甲兵资实，不弱于孙吴，更不减于刘备，何以要待刘备来建立蜀汉形成曹、孙、刘三家对峙！可见“经济均衡论”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历史发展的整个长河来看，王朝兴

^①葛伯赞：《中国历史纲要》第2册第5页。

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南北对峙都一再出现，而三国鼎立是唯一的一次历史存在，可见这一历史局面的出现是一个特例。特例是历史发展中的变异，就象生物遗传工程上的变异一样，有它变异的特殊原因，而不能用“常规”的必然性理论去解释。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封建王朝，最长的莫过于两汉、盛唐、朱明、大清，这几个朝代都没有超出三百年。短命的王朝如秦朝、新莽、隋朝只有十几年或几十年。每一个封建王朝解体，都要出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而后走向统一，形成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性运动^①。这可以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运动。因为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即使在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下，“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②”，中央集权力量一旦削弱或解体，就要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割据混战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它是不能持久的。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要求统一，反对分裂，这是历史的趋向。群雄割据中的优胜者，顺应历史的趋向，他就能削平战乱，统一中国。秦、两汉、隋、元、明等封建王朝末年的战乱，很快走向了统一，这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常规。南北对峙就打破了这一常规。中国历史上有东晋与北方十六国之对峙，有南北朝之对峙，有北宋与辽之对峙，有南宋与金之对峙，这些对峙历史都有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而不能用“经济均衡论”加以解释，更何况三国鼎立。

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主要历史原因，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迫使政治腐败的汉人政权退到南方，依恃长江天堑作为屏障

①《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不能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观点，而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朝代兴亡分合的总概括，而发展方向是走向统一与巩固，故引作“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②《皇朝通志》卷2 卷第587页。

而偏安江南。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一再重演，所以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就一再出现。东晋与南宋两个时期的南北对峙，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北方，而人心向背也有利于南方，因此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岳飞抗金都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是由于南方政权的政治腐败而使北伐总是归于失败。显然“经济均衡论”在这里是无法解释的。东汉末年没有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而是军阀混战演成了三分，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因而形成了一个历史发展的特例。

“经济是基础”，任何时候这都是立国的基本条件。东汉末年的战乱，北方经济残破，没有力量支持曹操不停顿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确是三国鼎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曹操南下荆州，接着又东进赤壁，连续大规模作战，北方经济无法承受。吴国的朱治就说：“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乎室，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①。”周瑜论曹操必败，原因之一是“又今盛寒，马无藁草^②”，也说明了北方后勤供应不继，士卒乏衣粮，马乏草料，乃是一种冒进。但是，当时曹操已得天下十之七、八，长江上流的益州牧刘璋遣使请降，只有区区江东六郡相抗，且孙权内部未靖，山越未服，南北对抗众寡悬殊，并未形成均衡。只要曹操计划周密，时机得宜，不冒进赤壁，完全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赤壁战后，荆吴之势强，刘备入蜀，三国鼎立形成，才出现了南北的经济均衡，对于“三分对峙”，有一定的影响，但仍不是主要的因素，因为曹魏的实力，仍大大强于吴蜀二国力量之和。尤其是蜀国这个弱小政权，远不敌曹魏，而诸葛亮居然能够屡次北伐。蜀国所恃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吴蜀

①《三国志·朱治传》裴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周瑜传》。

两国的互为犄角之援。经过几十年的对峙，北方经济恢复，吴蜀两国政治昏暗，人心反向，曹魏的人力、物力占了压倒的优势，三国也就归于一统了。经济的因素最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反证，三国鼎立决定于南北的经济均衡。

三国鼎立有着多因素的历史原因，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演变才形成的。如果我们划分一下三国鼎立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可明显地看出来。不过划分三国历史的发展断限，十分复杂，难以用一个标准来统一，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分段标准，都可成立。排定历史编年，可以王朝体系划分历史断限，三国鼎立始于公元220年的曹丕称帝，迄于公元265年的西晋建立，前后46年。在西晋建立之前两年，蜀汉已亡，历史进入了晋吴两国的南北对峙。但作为一个有始有终，因果相连的历史时期，三国纷乱的历史，应起于公元190年的军阀混战，迄于公元280年的西晋灭吴，前后91年。研究三国历史，不追溯东汉末的军阀混战，就不能说明三分的由来和三国史事的因果；不讲西晋灭吴，就没有结尾。这91年的纷争历史可以从两种角度来划分三国历史发展的断限。从三方对峙国别史的角度来叙述，可划分为三国形成时期、三国发展时期、三国走向统一时期三个阶段。从公元190到220年是形成时期；从公元220到239年魏明帝之死为三国发展时期；从240年到280年是三国衰落走向统一时期。这样划分是着重讲三国形成后的历史发展，而把三国的形成只是作为一个引子。但是我们如果侧重于三国鼎立为什么会产生，则应着重讲三国形成时期的历史，三国对峙历史不是主要的叙述对象，这样发展断限的划分就会迥然不同。陈寿的“三国志”则是侧重于三国形成时期的历史叙述，即详于乱而略于治，或者说详变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本文着重探讨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从这一角度可将91年的三国历史划分为群雄割据、三国鼎立形成、三国对峙并走向统一三个阶段。公元190至207年是东汉末群雄割据阶段，前后18年，从

人才均势上形成了曹孙刘三个集团。公元208年赤壁之战至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是三国鼎立形成阶段，前后22年，三方斗争交错，内容复杂，形势发展瞬息万变，最终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和政治均势，三国鼎立才得以确立。公元230年至公元280年，是三国对峙并走向统一的历史阶段，前后51年。半个世纪的“三分对峙，”地理均势起了主要作用，南北的经济均衡作为地理均势的补充也起了重要作用。研究三国鼎立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第一、二两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可以鲜明地看出，“形成三分”实非某种单一的历史原因所决定，也并非必然要出现的局面，而是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通过无数的偶然事变，交互作用的结果。当然，历史的偶然又寓于必然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这种寓于必然之中的偶然是怎样引导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将复杂的历史内容规范在简单化的必然性公式模式中。

所谓“必然”，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向和客观的历史条件。东汉末年豪强地主集团的经济膨胀有很大的割据性，必然带来军阀割据混战；反过来，割据兼并必然导致统一，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向。南北的经济均衡和吴蜀两国所依恃的地形险阻，是客观的历史条件。所谓“偶然”，是指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分鼎立的局面。这一局面是由于三分的人才均势，三分的地理均势，三分的政治均势等多种历史原因的交叉才形成的。三分的人才均势，三分的地理均势，三分的政治均势都是“偶然”的事变。这些历史事变是“人谋”起了主导的作用。下面分层次论述三国鼎立形成的多因素历史原因，并着重分析“人谋”的历史作用，以供讨论。

二、东汉末军阀混战所形成的三分人才均势

三分的奠定，首先是在军阀混战中，使汉末人才分散，形成

了曹孙刘三个坚强的领导集团。

汉末军阀，穷凶极恶的董卓，顽悍乐杀的公孙瓒，贪利赖宠的陶谦，倏彼倏此而横的吕布，狂愚而逞的袁术，雍容论道的刘表，昏暗懦弱的刘璋，都无戡乱之才，他们的作用是为胜利者驱除，在群雄角逐中注定要被歼灭。志大略疏的袁绍，文武兼资的曹操，弘毅宽厚的刘备，任才尚计的孙权，都有统一天下之志，任人有方，馭才有术。而后袁绍败亡，演成了三分之局。

官渡之战奠定了北方的统一，消除了一个争天下的强手；赤壁之战曹操受挫，孙刘之势强，于是奠定了三分之势。本来这两次战役都有混一天下的可能。袁绍鹰扬河朔，雄视天下，设若官渡之战袁胜曹败，袁绍君临天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曹操统一北方，“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①”，若赤壁战胜，称孤道寡乃必然之势。但这两次战役都是强者败，弱者胜，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历史的天平，使偶然因素变成了必然之势。这里的“偶然”，是指曹操官渡告捷，孙刘赤壁战胜，带有“偶然性”；但“偶然”胜利之后，使形势逆转，成为了不可战胜的强者，这就是“必然之势”。反过来说，叱咤风云的袁绍和曹操，不听谋臣劝谏，丧失了取胜之道，只是“偶然”的一着失计，造成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必然”后果。

袁绍之败 袁绍在官渡之战以前一直是走上坡路的。他积聚了许多争天下的优势。袁绍不仅有可恃的袁氏四世五公的政治资本，而且他本人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具有雄略的气质。在政治斗争中，袁绍主谋诛灭宦官，又首倡讨董卓，大得人心。韩馥让冀州，袁绍受之，而豪杰之士多归之，数年之间，遂兼有河朔四州，天下无敌。沮授、田丰、审配、逢纪、辛评、辛毗、郭图、许攸等智士为之谋，麴义、颜良、文丑、高览、张

^①《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江表传》。

郃等勇士为之统其军。但是官渡之战、袁绍一败涂地，从胜利的顶峰跌落下来，坠入了灭顶的深渊。袁绍官渡之败的主要原因是因胜而骄，一意孤行，以个人之智敌曹操之群士。他不纳田丰之谋，不用沮授之计，既要急于进取，而又坐失战机，不在曹操东征刘备之时进军，焉能不败？袁绍外宽内忌，能聚人而不能用人，不仅荀彧、郭嘉、董昭等智士离他而去，就是效死之士如沮授、田丰等也无所施其能。张郃、许攸则因其计不用，愤然阵前倒戈。袁绍逞个人之智，又碰上了曹操这样一个棋高一着的对手，他就难逃覆败的命运了。官渡之败暴露了袁绍的弱点，他不是曹操的对手。在奉迎献帝问题上，袁绍拱手让曹，就输了一着。然而这是对全局成败有决定性影响的一着，袁绍输了，处处被动。曹操赢了这一着，全盘皆活，处处主动。袁曹二人相较，袁绍凭藉的是“力”与“地利”，曹操依靠的是“智”与“道术”，两人政治素质的优劣不待分辨而高下自分。《武帝纪》中有曹操与袁绍如下的一段对话：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实现了他的“南据河，北阻燕、代”，也可算得上群雄中的佼佼者。但与曹操相比，袁绍只是一个“小器”。王夫之说：“起于纷乱之世而欲成大业，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以建非常之业^①。”袁绍能屈韩馥、公孙瓒之辈，而不能屈曹操，故不能建非常之业。曹操高于袁绍，不只是个人的政治素质，而主要的是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线。袁绍看重的是地利和兵力，曹操看重的是人才和道义。所以诸葛亮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

^①《读通鉴论》卷九。下引王夫之语均出此篇，不再注。

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①。”十分精当。

曹操赤壁之败 曹操用兵如神，善能以少胜众，以弱克强，但在赤壁之战中却是御众而败，盛强而摧，大出人意料之外。王夫之分析说：“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这就是说，曹操也没有真正做到诚心任用智力以扶持大义，而是为一己之私利用权术驾驭人才。谋士的意见，投合自己的私心就采纳，不投合自己的私心就不采纳。曹操的赤壁之败，正是如此。他不听贾诩、程昱的善计而急于东进，重蹈了袁绍拒谏的覆辙，走上了恃众欺寡，恃强凌弱的失败之路。曹操之急于东进，也正如袁绍之急于南下一样，是急于做皇帝梦，故冒行以建非常之功，结果是志骄意得，欲速而不达，被孙刘联军的智力所击败。赤壁之战是一场斗智斗力的群英会。孙刘两家的谋臣武将，齐心合力共御曹操，而曹操却颐指气使，以一人刚愎自用之智，抗天下群英之会，败亡也就是必然的。

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都是奠定三国鼎立的重要战役。前者袁绍失败，后者曹操失败，使统一的局势一再受挫，而演成三分之局。这两次弱者挫败强敌的战役，都是“人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赤壁之战，刘孙联合的基础就是以人才三分的均势为前提的。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就是“人谋”在规划三分。尽管刘备败逃，无存身之地，但“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②”所以孙权就对诸葛亮说：“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③。”诸葛亮出使江东是以鼎足之形为条件与孙权进行谈判的。他对孙权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

①《三国志·诸葛亮传》。下引诸葛亮语出此篇者不再注。

②《三国志·程昱传》所载曹操谋士程昱语。

③孙权语见《诸葛亮传》。

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东汉末军阀混战，为何人才三分，这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是一系列偶然事变的分合所形成的必然之势。前已述及，荀彧、郭嘉、董昭，初投袁绍，后归曹操。鲁肃与刘晔友善，最初欲依巢湖郑宝，而后两人分道扬镳。诸葛瑾、诸葛亮，同胞兄弟，一个辅孙权，一个佐刘备。在乱世之中，局世未明朗之时，际遇交合带有较大的偶然性。但是人往高处走，天下扰攘，君择臣，臣亦择君，又是必然之势。东汉末年的人才形成三分而未若江河之归大海，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试分析如下：

客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汉朝还没有完全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刘姓皇帝仍是一面旗帜。两汉儒学昌盛，它所宣传的君权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士大夫多尚气节。袁绍在反对董卓废立时就说：“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适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①。”二是东汉世家大族正处于上升时期，多名节之士。尤其是两次党锢之祸，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政，赢得了天下人的归心。这两个客观因素对曹操有得有失。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了优势，四方人才多归往之，这是得。但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的庶族，初起时不敌袁绍，不仅使得一部分北方士人流归了袁绍，如沮授、田丰、审配等；而且延迟了他统一北方的时日，眼看孙权坐大、刘备寄居荆州而不能及早消灭，这是失。关东军讨董卓，孙坚力战第一，义动天下，也赢得了一部分人才的归心。张昭、周瑜、程普、黄盖等倾心辅佐孙氏兄弟，这是孙吴之得，反之则是曹操之失。刘备以帝室之胄，“受左将军之命，躬膺天子之宠任，而又承密诏以首事，先主于是乎始得乘权而正告天下以兴师^②”，露布衣带诏讨曹，使曹操蒙受“托名汉

①《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献帝春秋》。

②王夫之语，见《读通鉴论》卷九。

相,其实汉贼”^①的恶名,而刘备则以正统自居,诸葛亮辅刘备,不仅仅是报三顾之恩,而且也是扶持正统。这是刘备之得,亦是曹操之失。

主观原因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曹操的对手刘备、孙权都是人中之杰,总揽英雄有很大的号召力。二是曹操品德不济,奸险诈伪,暴虐无比,使得一部分智士远离了他,象诸葛亮、庞统等人宁肯归隐待时,也决不北投曹操。陈宫、张邈之叛,就是鄙薄曹操的为人。曹操傲慢,把蜀中使者张松推给了刘备,这是最大之失。东晋史家习凿齿评论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②?”曹操不仁,多次屠城,滥杀无辜,并在征战中颁布了“围而后降者杀无赦”的反动军令,所以他始终未能获得“天命攸归”的舆论。曹操兵围汉献帝,失人臣礼,始终带着“汉贼”的帽子打天下。曹操的这些弱点为孙、刘所利用。因此,曹操不能象他的先辈汉高祖、汉光武那样囊括天下英雄,也就不能统一天下,只好作了个半壁河山的“周文王”而饮恨九泉。

三、曹孙刘三方的军事、外交斗争和 三分地理均势、政治均势的形成

三分的地理均势和政治均势都是三国鼎立的必要条件。这两个条件是伴随着曹孙刘三方之间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而出现的,也是“人谋”因势利导而形成的必然之势。

所谓地理均势,是指割据集团利用地理条件抗衡对方的一种策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使用戈矛甲盾作战,因此占有险

^①周瑜语,见《三国志·周瑜传》。

^②三国志·刘二牧传》裴注引《汉晋春秋》。